

目錄

中文版前言	5
導言	9
第一章 邊疆少年 1894 – 1914	27
第二章 初出遠門 1914 – 1921	67
第三章 第一次暴動 1921 – 1924	95
第四章 再出遠門 1924 – 1925	117
第五章 第二次暴動 1925 – 1929	137
第六章 第三次暴動：地方革命融入全國革命 1929 – 1930	199
第七章 失敗：革命的生態和文化因素 1930 – 1932	263
第八章 作為國家與地方之間中介和紐帶的紅神	317
結語	353
參考書目	361

地圖、照片

地圖一	東蘭的位置	29
地圖二	桂西北的左江、右江、紅水河、龍江流域	30
地圖三	當代東蘭縣地形圖	36
照片一	韋拔群的出生地東里村	51
照片二	北帝岩（列寧岩）	149
照片三	武篆魁星樓	220
照片四	武篆魁星樓邊的鄧小平和韋拔群雕像	223
照片五	東里村的紅神廟	324
照片六	香茶洞洞口	341
照片七	東蘭革命烈士陵園中的韋拔群墓	343
照片八	緊鄰東蘭縣革命烈士陵園的韋拔群紀念館	344

中文版前言

自 1980 年代進入學術界以來，我的研究興趣逐漸演變為中國與東南亞這片廣大區域內的三重互相關聯的重要關係，即知識份子與農民的關係、國家與少數民族的關係，以及中國與東南亞、特別是越南的關係。大體說來，1992 年前的八年間主要是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學習和探討與民族史、民族關係和民族政策有關的一些問題；1992 年之後我開始關注越南北方的華僑華人，從而開始把民族關係，即作為越南少數民族的華僑華人與越南主體民族和政府之間的關係，與中國和越南之間的國際關係結合起來；1995 年轉入夏威夷大學後，我用五年時間完成了一篇有關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知識份子與農民關係的博士論文，但對於知識份子與農民關係這個新寵的喜愛，並未削弱我對於民族關係和中越關係這兩位舊愛的迷戀。

這三重關係的互相疊加和交織，帶給我的是間歇性的輕度困惑和無窮盡的自得其樂。

在學習華南和東南亞民族史和民族關係時，就曾接觸過韋拔群這位中國最大少數民族壯族的最重要代表人物，而此後在探究知識份子與農民關係問題時，又認識了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最有影響的農民運動領袖之一的韋拔群。在構成我個人學術世界的三重關係中，韋拔群是民族關係以及知識份子與農民關係這兩重關係中的核心人物，而他同時也是中越關係中的邊緣人物：他的故鄉廣西與越南接壤；越南是他到過的唯一的外國；他的一些追隨者在他遇難後曾長期在中越邊界一帶從事革命活動。

正是由於他與我所鍾情的三重關係的交集，韋拔群很自然地成為一位我希望能夠深入了解的人物。在 2003 年修改完博士論文之

後，我開始全力搜集有關韋拔群的資料，準備為他立傳。在其後幾年間，我曾經多次到廣西，其中三次到訪韋拔群的故鄉東蘭，最終得以在 2012 年完成書稿，並由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在 2015 年出版。特別令我欣慰的是，2016 年 9 月我第四次前往東蘭去完成還願之旅時，能夠手捧韋拔群的第一本英文傳記在他的出生地東里村、他和鄧小平一起居住過的武篆魁星樓、他的遇難地今巴馬瑤族自治縣的香茶洞和他的埋骨之地東蘭縣城等處與他做隔世的精神交流。如果說在我剛開始把他當做一個研究對象來仔細考察的時候，還曾試圖在他和我之間保持一定的距離，以便我能夠保持一種永遠可望不可即的中立和客觀的話，在書成之後，一方面因為不再有所顧忌，另一方面由於對他已相當熟悉，我已能在想像中移除作為研究者的我與作為研究對象的他之間的距離，甚至常常能在想像中把自己拔高為「拔哥」的朋友。在東蘭期間，有時會設想的一個場景是：拔哥的在天之靈讀到了我書中的某個章節，然後高興地對我說：「這段寫得不錯」，或是氣呼呼地對我說：「這段你不該這麼寫！」

為拔哥作傳期間曾得到眾多師長、同事、朋友和家人的幫助。為了表達對他們永遠的感激之情，請允許我抄錄幾段英文版中的致謝詞：

眾多師友、同事和家人的幫助使得我對韋拔群人生和革命意義的長期探尋成為一段愉悅而有益的學習經歷，並使我能夠最終完成這本小書。

南寧的范宏貴和陳欣德以及河池的牙遠波都非常慷慨地與我分享他們的資料和見解。百色市委黨史辦和百色市檔案館都熱情地接待過我，而市檔案館韋咏梅的幫助特別重要。百色起義紀念館特許我在書中使用館藏韋拔群塑像的照片。在東蘭，縣黨史辦的黃好業、施傑泰、汪宏華和韋輝曾兩次接待過我，並與我分享他們撰寫和編輯的著

作。縣政協的王皓為我提供了重要而不容易找到的東蘭本地出版的書刊。

吳義雄和潘蛟的邀請使我能有機會與中山大學和中央民族大學兩校的部分師生就韋拔群研究進行交流。

Stephen Uhalley Jr.、Paul Hansen、Bruce Bigelow、李懷印和 David Mason 都讀過部分章節或整篇書稿，並與我分享意見和建議。與 Jerry Bentley（已故）、戴仁樹（Richard L. Davis）、Edward Shultz、黃興球和黃鶯的交流令我獲益良多。Monte Broaded、Antonio Menendez、Bob Holm 和 Scott Swanson 也為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持。

巴特勒大學 Irwin 圖書館的 Susan Berger 通過館際互借系統為我借到大量書籍和文章。巴特勒大學寫作工作室的 Matthew Jager 細緻地校閱、編輯了全書初稿。

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的兩位匿名評審人曾給予我深具啟發性和建設性的總體評論和具體建議。安樂哲（Roger Ames）和 Nancy Ellegate 對於我前後兩本書的出版都同樣用心。在本書印製過程中，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的 Eileen Nizer、Jessica Kirschner、Ryan Morris 和 Michael Campochiaro 都曾給予及時而耐心的指導和幫助。

我的老師們，廈門的吳文華、北京的李毅夫以及夏威夷的郭穎頤和張寶林，總是毫無保留地給予我睿智的指教和慷慨的鼓勵。

夫人劉萌是初稿的第一位讀者，後來又通讀定稿，並提出諸多修改意見；弟弟永青多次幫忙購買舊書；兒子博寧讀過部分章節，同時也一直是一位出色的技術助理。

英文版出版以來，致謝詞中提到的吳文華、范宏貴和李毅夫三位老師已先後辭世。不能把本書的中文版親自送到他們手上，是一大

憾事。

本書基本上是英文版的翻譯，但從書名到內容都有一些改動。中文版與英文版的差別主要在於：其一，英文版中的一些錯誤在中文版中得到糾正；其二，中文版根據英文版出版後搜集到的一些資料做了一些修正和增補。我要對曾在翻譯過程中給予我大力協助的王藝璇、譚景輝和曾強，以及為我重新製作三幅地圖的張夢婷深表謝意，也要特別感謝李向紅、何雨蕾、陳元中、李寧等朋友在搜集補充資料時給予我的幫助。本書得以順利出版，也有賴於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提供的研究資助。

老朋友林少陽是本書的重要推手。他的鼓勵和認可使我能夠積極地面對一些困難。我也衷心感謝周悅、張謙、黃彥對本書的厚愛以及劉蜀永和黎耀強的關鍵性支持。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雖然上面提到的和一些沒有提到的人士和機構都為這本書的寫作、翻譯和出版提供了幫助，但本書的內容，包括書中的觀點和謬誤，都由作者本人負全部責任。

最後，我願把這本書的出版當作一位深深迷戀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研究者對於 2020 年東蘭脫貧、2021 年辛亥革命一百一十周年和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周年，以及 2022 年韋拔群遇害九十周年的一種紀念。

導言

這是 1932 年 10 月 19 日，黎明前的黑暗時分。

年輕壯實的韋昂，正坐在香茶洞洞底的一攤火堆旁，而這個山洞則坐落在中國南方廣西省東蘭縣西山地區綿延不絕的崇山峻嶺中的一個山坡上。此刻，跳動的火光不時映照出韋昂臉上的麻點——那是天花留下的印記。在他的腳邊，依次躺着他的母親、小老婆和妹妹。他們一家四口是為了逃避國民黨軍隊發動的對共產黨人的最新一輪武裝清剿而躲避在這裏。韋昂認為這個山洞足以保障他們的安全，因為它距離最近的道路已經足夠遠，而且洞口還被樹木和草叢遮蓋着。

香茶洞大約有三米深，洞底很窄。在與洞口相對的洞壁上，韋昂找到一處高出地面幾米的凹坑，面積不大但足夠被當作「臥榻」來躺着休息了。在這個「洞中之洞」裏支着一張用三塊木板拼湊起來的床鋪，兩個男人正在「床」上酣睡着。洞中氣溫太低，為了禦寒，他倆各自裹緊了厚厚的毛毯。

韋昂卻徹夜未眠，因為他需要為這兩名熟睡的男子擔任警戒。此外，他還必須面對一個艱難的抉擇。

這兩名男子中，有一個正是韋昂的叔叔韋拔群。他是以江西為根據地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中央執行委員，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就是毛澤東。除去這個主要具象徵意義的職務外，韋拔群還是中國工農紅軍右江獨立師的最高指揮官，也是右江革命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比這些官式頭銜更重要的是，自 1921 年以來，韋拔群一直是東蘭農民運動最重要的領袖，也是整個右江地區乃至廣西全省最有名的革命者或「匪首」。

過去兩晚，韋拔群帶着他的警衛員羅日塊和韋昂一家躲在香茶

洞，但韋拔群和羅日塊已計劃第二天一早便動身前往鄰省貴州，以逃避國民黨人的追捕。

韋昂幼年喪父，而韋拔群一直「叔兼父職」，供他衣食溫飽、幫他娶妻成家，後來又帶他參加革命，並對他委以重任。有一段時間，韋昂還擔任過韋拔群的警衛員。

投身革命之後，韋昂的地位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他不再是當初那個吃不飽穿不暖的農夫了，甚至還給自己討了個小老婆——這在當時是只有那些有錢有勢的男人們才能享受的特權。然而，韋昂想得到的遠不止這些。遺憾的是，韋拔群發起的革命，雖然曾經那麼勢如破竹、前程似錦，此時卻面臨着崩潰的邊緣。整個右江獨立師已被打散，革命領袖們要麼躲進山洞，要麼逃往他鄉，革命根據地的地盤已大部喪失，而根據地的中心區域也已陷入國民黨軍隊的重重包圍。韋昂覺得，革命已是生機渺茫，而韋拔群也不可能重新崛起。如果說，韋昂對在革命興旺時期曾給他帶來「好日子」的韋拔群曾懷過感激之情的話，那麼現在，他對這個害他陷入困境的叔叔卻已產生幾分怨恨。在他看來，堅持這場正走向失敗的革命不只會帶來麻煩，還會傷害很多性命。韋拔群的親屬們有不少已經被殺害了，而韋昂並不想成為下一個被殺的人。

為了徹底剿滅右江地區的革命，廣西省政府宣佈懸賞捕殺共產黨領袖們，而捕殺韋拔群的賞格當然是最高的，在 1931 年是一萬銀元，一年後更是漲到一萬四千銀元。這筆錢足夠讓韋昂和家人安度餘生。除此之外，韋昂還盤算着，他如果殺了韋拔群，國民黨就不會再把他當做共產黨，他就不只可以活下來，而且能夠享受一個守法公民可以得到的一切自由。他一刻都不想繼續待在這山洞裏了。

韋昂在那個寒夜所經歷的痛苦和猶豫源自於一種矛盾：一方面，他渴望金錢、生存和自由，另一方面，他內心裏還殘存着一絲對叔叔的親情。雖然在小老婆陳的伯等人的勸說和協助下，韋昂已經與駐紮在鄰近的武篆鎮的國民黨部隊達成交易，但他對於是否真要完成這筆

交易依然猶豫不決。韋昂還擔心，他若是殺了叔叔，那他就會成為眾人眼中的忘恩負義之徒和為求自保而不惜殺害親人的懦夫，而叔叔韋拔群那些還活着的部下則會認定他是叛徒，要他血債血償。「可是，拿了這些銀元，我就能遠走高飛，再也不回東蘭了」。這樣想着，韋昂在黎明之前終於決定下手了。他很清楚，幾小時內，叔叔就將逃離廣西，而且近期不會回來。太陽即將升起，叔叔和他的警衛員隨時都有可能醒來。韋昂知道他已經不能再等了。

據說數年後，已搬往柳州居住的韋昂曾對人說，他之所以最後還是決定對韋拔群下手，除了有人已向他表示允諾「不殺頭、給錢、給好地方住」之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一是韋拔群殺過他的一位親屬，二是韋拔群已決定帶人去貴州找賀龍，但沒有叫韋昂一起去，讓他感到進退兩難。另外幾位參與設計謀害韋拔群的本地人也自認為與他有血仇。¹ 怨恨和復仇的念想把他們連在一起。

心意已決的韋昂慢慢起身，朝洞口的草叢中扔了幾塊小石頭，弄出一些聲響。床上的兩人沒有任何反應。韋昂又慢慢走到韋拔群身邊，輕輕說道：「叔叔，敵人來了！」韋拔群依然沒有反應。昨天以來，韋拔群就病得很重，睡覺時更是用厚毛毯裹住了自己的整個腦袋，以抵禦洞中的寒氣。因此，即使是醒着，他也不容易聽見任何聲響。床上的另一個人羅日塊，也因為連日的奔波而精疲力竭，此時還在夢鄉中。羅日塊只是個年方十五的毛頭小夥，連槍都沒有，與其說是警衛員，倒不如說只是個嚮導。²

在確定拔群叔叔和他的警衛員都還在沉睡之後，韋昂迅速抽出枕在叔叔腦袋下的手槍。他知道這把手槍已經上滿子彈。昨晚韋拔群

1 東蘭縣公安局：〈關於殺害韋拔群等烈士的反革命罪惡材料調查報告〉，1960 年 10 月 27 日。

2 方大恒、鄒文生：〈左右江革命根據地的肅反保衛工作〉，《左右江革命根據地》（下），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第 1133 頁。

在床上躺下之後，韋昂曾提醒叔叔要把子彈裝好。「你的槍要上好子彈，防止火線（打仗）」，他這樣警告叔叔。韋拔群聽從了韋昂的建議，起身給手槍裝滿了子彈。³ 此刻韋昂抽出的正是這把手槍。他使勁扣下扳機，對準叔叔的腦袋連射了兩槍，頃刻間結束了韋拔群的生命。

槍聲驚醒了羅日塊。他從床上一躍而起時，韋昂正將毯子從韋拔群身上拉開。羅日塊瞥見韋拔群鮮血淋漓的腦袋，立刻意識到他已經死了。羅慌忙往洞口方向逃去，但韋昂捉住了他的胳膊，然後用手槍抵住羅的腦袋，喝令他割下韋拔群的首級，並放進一個籬筐裏。隨後，羅日塊又不得不背起籬筐，向武篆鎮走去，身後緊跟着用槍指着他的韋昂。一路上，韋昂逢人便說：「我今天擦了拔群的頭，你們要看就去（武篆）。」⁴

當天早上七點左右，武篆的國民黨駐軍就收到了韋拔群的首級。在確認頭顱的主人的確是韋拔群之後，官兵們激動不已。他們決定把這個可怖的「戰利品」掛在他們團部駐地魁星樓的大門上，立即就有七百多位當地居民趕來圍觀。⁵ 僅僅兩年之前，魁星樓還是韋拔群領導的蘇維埃政府的辦公地點。韋拔群的首級在抵達武篆之後不久，就又被送去東蘭縣城示眾。東蘭縣當局先是為首級拍照，然後又將它放入防腐液中以防腐爛。後來，省政府下令將韋拔群首級送往廣西省會南寧，以便省城居民「一睹為快」，「並認識其面目」。⁶ 除了省會南寧，韋拔群的首級還被送往省內各大城市示眾。這場韋拔群首

級的巡迴示眾，直到 1932 年 11 月底才告一段落。⁷

國民黨方面預測，韋拔群之死會讓東蘭及周邊的共產主義運動徹底消停。雖然他們知道韋拔群的許多追隨者都還活着，並可能試圖讓他的運動起死回生，但國民黨方面確信，就給他們製造麻煩的能力而言，這些追隨者沒有人能夠比得上韋拔群。共產黨方面贊同國民黨當局的判斷，認為韋拔群之死無疑是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巨大損失，而作為地方革命領袖，韋拔群是無人可以取代的。韋拔群死後，他的支持者中有許多人因為徹底喪失對革命的信心而放棄鬥爭，而另一些人，不僅永遠痛心他的死難，還更加堅定地繼承他的遺志，並以極大的熱情把他樹立為烈士和英雄。在韋拔群逝世三十周年之際，曾和他共事的鄧小平為這位老朋友寫了一長段悼詞。鄧小平形容韋拔群是「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英雄」、「名符其實的群眾的領袖」和「模範的共產黨員」。在悼詞結尾，鄧小平寫道：「韋拔群同志永遠活在我們的心中，他永遠是我們和我們的子孫後代學習的榜樣，我們永遠紀念他！」據說毛澤東曾說韋拔群「是壯族人民的好兒子，農民的好領袖，黨的好幹部」，周恩來也稱韋拔群「是全中國人民的英雄」。⁸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史學界特別是廣西史學界把韋拔群和另外兩位共產黨高級領袖彭湃和毛澤東相提並論，認為他們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三大農民運動領袖」。⁹ 其實，在這三人中，按照時間順序，韋拔群可能是投身於農民運動的第一人。韋拔群早在 1921 年底就開始組織農民了，而彭湃 1922 年中才開始發動海豐的農民運動，毛澤東直到 1925 年才真正意識到農民的力量。在毛澤東的故鄉湖南省，起始於 1920 年代中期的農村革命是在都市革命運動

3 羅日塊：〈回憶韋師長犧牲前後〉，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會黨史研究室編：《韋拔群陳洪濤史料專輯》，南寧：2006，第 462 頁。

4 同上，第 462 頁。

5 覃彩五：〈東蘭痛史（下編）〉，左右江革命歷史調查組編，《左右江革命史料彙編》，第 3 輯，南寧：1978，第 259 頁。

6 〈白副總座令將該匪首級解送來邕懸重賞購緝共匪黃大權等文〉，《南寧民國日報》，1932 年 10 月 25 日。

7 〈韋匪首級示眾和掩埋〉，《梧州民國日報》，1932 年 11 月 20 日。

8 黃現璠、甘文傑、甘文豪：《韋拔群評傳》，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第 518 頁。

9 藍懷昌、李德漢：《群眾的領袖韋拔群》，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獻詞。

之後發生的。¹⁰ 韋拔群也是最早發動農民暴力革命的領袖之一，他在 1923 年就組織了連續四次對東蘭縣城的攻擊，震動了廣西全省。有人認為，連毛澤東都承認，他在 1920 年代曾經向韋拔群學到過有關如何發動農民運動的一些經驗。¹¹

對於東蘭縣當地的農民來說，韋拔群不單是一位革命者。在他們的意識中，韋拔群活着時是一位地方豪傑，死後則成為半人半神一樣的存在。韋拔群的敵人對他恨之入骨，不願放過他留在香茶洞的無頭屍身。當韋拔群的首級被送到武篆後，一群國民黨官兵來到香茶洞，將韋拔群的殘軀付之一炬，直到確定韋拔群已被從肉體上徹底消滅之後才離開。幾個月後，一群村民在一個黑夜潛入洞中，在灰燼中找到一些韋拔群的焦骨。他們隨後把這些遺骨埋葬在韋拔群故鄉的一處山腳下。為了防止國民黨方面認出和破壞韋拔群的墳墓，村民們便把它改建成一座神廟，並命名為「紅神廟」。韋拔群還活着時，他在當地的追隨者們就已經開始宣揚他的神力。韋拔群死後，他們就把他變成一尊真神。這是一尊紅神，而這尊神曾經是一位革命者。

部分地由於這種「神化」，村民們不斷地傳頌着有關這尊神靈的故事，使得那些一心想探尋真相的人們很難把歷史與神話分開。例如，韋拔群死後，關於 1932 年 10 月 19 日凌晨在香茶洞裏究竟發生了什麼，就有些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在韋拔群被謀害的時候，韋昂的母親、小老婆和妹妹都在洞中。也有人相信，當時只有韋昂的小老婆在場，或者這三個女人都不在場，因為她們當晚都住在武篆。有人聲稱，在韋昂朝韋拔群開槍時，羅日塊正在洞外站崗，但羅日塊本人卻回憶說他當時正睡在韋拔群的身邊。有人相信韋昂只向韋拔群頭部

開了兩槍，也有人認為是三槍，甚至多達八槍。有人說，韋拔群在韋昂試圖掏出他枕着的手槍時就被驚醒了，並且曾經喝令韋昂放下武器，但大多數人堅持認為韋拔群是在睡夢中被槍殺的。有人相信韋拔群的頭顱是韋昂割下來的，也有人認為是羅日塊幹的——當然，是韋昂逼迫他幹的。不過，至少各種說法都認可一件事實，那就是：1932 年 10 月 19 日凌晨，韋拔群被他的侄子韋昂槍殺在香茶洞中。對於韋拔群生活中的其他片段也存在着類似的爭議和共識。各種說法對於重要方面的描述往往趨向一致，但在細節上卻常常相去甚遠。

韋拔群是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在中國大地上崛起的眾多農民運動領袖之一。如果以出版物的數量來衡量的話，韋拔群比大多數其他農民運動領袖都更受中國學者和作家們青睞，但同時卻受到國外學者的忽視。有關韋拔群的中文著作的作者，大都來自廣西，其中很多是各級黨史研究部門的研究人員。他們為破解韋拔群生命中的眾多謎團以及收集和保存有關韋拔群的資料做出了重要貢獻。在國外，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於 1972 年發表的九頁論文，至今仍是有關韋拔群及其農民運動的唯一英文文獻，¹² 韋拔群的名字還曾出現在一些有關二十世紀廣西以至中國的英文文獻中。這是我決定寫作一部探討韋拔群及其革命運動的英文專著的原因之一，而在做出這個決定的同時，我也告誡自己要為作為人、而非作為英雄或神的韋拔群立傳，並把韋拔群的個人歷史與另外三個層面的歷史，即中國共產主義運動史、東蘭和廣西的地方史和民族史，以及二十世紀中國史融為一體。

我所依據的是四大類別的資料。第一類是韋拔群時代產生的資料，包括韋拔群本人的著作以及他的追隨者、敵人和第三方人員留下的演講稿、書信、詩歌、日記、新聞報道和政治文件。第二類是回憶

10 Angus W. McDonald,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Elites and the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1911-1927*.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

11 黃現璠、甘文傑、甘文豪：《韋拔群評傳》，第 518 頁。

12 Diana Lary, "Communism and Ethnic Revolt: Some Notes on the Chuang Peasant Movement in Kwangsi 1921-31." *The China Quarterly*, 49 (1972), pp. 126-135.